



議論風生

顧敏康

香港大學今年8月29日舉行開學典禮，學生會會長黃程鋒鼓吹新生要有「造反的勇氣」，宣稱「佔中」學生為所謂的「英雄」，更揚言期望港大未來有更多「英雄」誕生。據媒體報道，黃程鋒此前一直宣揚「港獨」，曾拒絕自己是中國人，還與鼓吹「港獨」的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關係密切。同樣在8月29日，香港教育大學也舉行「新生入學歡迎會」，學生會臨時委員會會長張鑫在致辭時也提及「香港獨立」。而理工大學校園日前發生的暴力事件，更是與學生會包庇「港獨」直接有關。據媒體報道，學生會不滿民主牆「港獨」標語被校方撕走，學生會會長林穎恒隨即糾眾包圍校長室，推撞副校長和禁錮教職員，事後還「惡人先告狀」，以絕食作為挾，要校方「交出」民主牆」的管理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校方居然與之達成協議，繼續賦權學生會管理民主牆，也沒提及違法管理的具體懲罰措施。

這些事件足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已經成為「港獨」的先鋒聲

，這些學生會的領導者披上「言論自由」外衣，公然行違法之事；第二，如同面對「佔中」、「港獨」言論，乃至學生無理圍攻，大學校方似乎總是顯得底氣不足，不敢像港專學院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陳卓禧校長那樣，理直氣壯反對挑戰法治底線的行為，令大學變相成為那些學生會一而再、再而三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溫床」。

「港獨」不再是偽命題，應該看到其與其他「四獨」（「疆獨」、「藏獨」、「蒙獨」、「台獨」）逐步勾聯，對國家發展帶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令國家內外受敵。其實早在回歸前，立法者就已經預計到「一國兩制」下香港有可能成為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從事破壞國家安全活動的地方，並與香港的政治性組織和團體勾連。因此，《基本法》第23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但是回歸以來，香港反對派一直對23條耿耿於懷，千方百計阻止對23條進行本地立法。自2003年第23條立法流產後，23條立法成為歷屆政府的禁忌，被束之高閣。這也客觀上導致「港獨」言行甚囂塵上。

學生會成激進派「政治跳板」

香港的大學也早已成為外國和本地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必爭之地，大學的學生會當然也是重點。另一方面，那些有野心的激進學生近年來也利用學生會作為「政治跳板」，投身政黨以及煽動「港獨」。最明顯例子就是「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他曾是嶺大學生會會長，之後加入學聯，有份策劃2014年非法「佔中」，及後成為學聯秘書長，並與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另組「香港眾志」，參選2016年立法會選舉，提倡實為「港獨」的「民主自決」。中國有句古話：「多行不義必自斃」。羅冠聰得意忘形，故意在就職典禮上違法宣誓，最終被DQ

。另一例子是劉小麗的幕後軍師黃永志，他曾出任中大學生會會長，之後成為「社民連」副秘書長，現是「小麗民主教室」成員。

學生會一方面濫用大學資源宣揚「港獨」，另一方面則經常搬出所謂的「言論自由」作擋箭牌。筆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當「港獨」言論與國家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完全有對其進行規制的必要性和合法基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這已經說明，為了保障國家安全，立法或根據現有的刑事法律限制及懲罰「港獨」行為是必要的。

大學高層須嚴處「宣獨」學生

面對「港獨」言行在大學盛行，大學高

層不能僅僅表態反對了事，而是應該以「國家安全」為上，採取切實措施遏制「港獨」言行，比如應該規管學生會的資金等。道理很簡單，公立大學由公帑建立，理所當然地應當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不容許校員內有鼓吹違憲和鼓吹分裂國家的行為。

近日有消息稱港會大學有意修改校規，禁止學生作出「影響學校聲譽」的言行，罰則可嚴重到取消學籍。倘若消息屬實，筆者舉雙手贊同。「影響學校聲譽」當然應包括違法宣揚「港獨」，必要的處罰並不會導致言論自由的減少。

行文至此，不妨再請各大學高層回味一下陳卓禧校長那段令人敬佩的話：「港專作為一間愛國愛港的學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這個是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的，即使殖民地時代都沒有退縮過！即使受殖民地政府的打壓、資助被撤銷、校址被收回，也從無放棄愛國立場！你們如果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們選錯了學校！」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G20峰會的「無果」之憂

國際動向

張敬偉

糟糕期。

本次阿根廷G20峰會，除了「習特會」和中美貿易戰這個焦點外，還包括了美加簽署新版的美墨加協定（USMCA），但是目前美加兩國在乳品問題上一直未能達成共識。加拿大和墨西哥對美國針對第三方的「毒丸條款」也不以為然。USMCA是美國反對多邊主義而實施雙邊談判的樣板，美加分歧也增加了美國在G20峰會上更加孤立的風險。此外，美國在美墨邊境通過軍隊阻止大篷車移民的做法，尤其是軍警向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跨境移民施放催淚瓦斯，已經引起拉美的集體憤怒。在阿根廷召開的G20峰會，也將匯集成美洲國家向美釋放怨氣的新高潮。

不久前的一戰百年紀念活動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特朗普的「口水戰」持續升級。本次G20峰會，高調反對單邊主義的馬克龍還會和特朗普有一番唇槍舌劍。美法兩國矛盾，已經上升為美歐齟齬。因此，在G20峰會上，歐洲領導人也將對特朗普強烈嗆聲。可預料的是，本次G20峰會將會形成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聯合對美的場景。在19對1的情況下，一直好鬥的特朗普或不願讓步，決定了G20峰會未必一定有「好結果」。而美國也對「無果」的G20峰會有了充分準備。11月27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強調，目前尚不清楚G20峰會是否有公報，並稱「如果沒有，也沒什麼好難過的。」

G7峰會沒有公報，美國將責任推給其他6國；APEC峰會沒有公報，美國埋怨中國；G20峰會沒有公報，美國恐難再次推卸責任。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經濟民生是正途 泛政治化無出路



議事論事

楊莉珊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代表建制派參選的陳凱欣勝出。反對派一直宣稱九龍西補選是專制與民主的對決，強調議席「一個都不能少」，但堂皇的口號掩蓋不了一個關鍵的事實：市民「希望將民生先行，大家衣食住行最緊要」。陳凱欣28日在立法會宣誓就任繼續表明，會履行優先關注醫療、房屋等民生議題的競選承諾，把市民聲音帶入議會。

立法會需要有陳凱欣這類建設力量，推動更多有利經濟與民生的政策。

踢走劣質政客返發展正軌

今次補選，是建制力量繼今年3·11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後的再一次勝利。如果說上次鄭泳舜以二千多票之差贏了姚松炎是「爆冷」，那麼這次陳凱欣作為政壇新人，沒有政黨背景，卻能以超過一萬三千票大幅拋離李卓人，選民用選票向反對派表達不滿的心態，已十分明顯。這反映求和請求穩定謀發展，已成為香港的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廣大市民更加明白，香港正處於發展的關鍵時刻，吵吵鬧鬧、撕裂內耗的局面應該結束，應該選出有建設性、做事實幹、真心為香港服務的人做議員，拒絕專搞政爭、漠視發展的劣質政客。

陳凱欣當選，確立建設力量在議會的主導地位，建制派和反對派在地區直選的比例由17席對16席，優勢擴大至18席對16席，反對派無法藉補選重奪分組點票否決權，減少了反對派在立法會干擾施政的機會，對保證施

政暢順意義重大。選舉結果有利在立法會確立拚經濟拚民生的主軸，遏止「港獨」、「自決」勢力和泛政治化的干擾，保障議會、政府正常運作，令香港發展重回正軌。香港社會受泛政治化困擾已久，非法「佔中」及旺角暴亂衝擊法治和社會安寧，反對派「拉布」成災，拖累經濟民生。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習主席選用「蘇州過後無艇搭」這一廣東話俚語，說出了香港現在遇到的機遇是千載難逢。「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歷史機遇聯袂而至，對香港歷史命運產生全域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香港社會應拒絕泛政治化，集中精力抓機遇、謀發展，一定要抓住歷史性機遇，千萬不能錯失。

近年來，反對派不斷蠱惑煽動，散播對內地盲目排斥、隔離的謬論。他們以泛政治化的手段，反高鐵、反「一地兩檢」、反港珠澳大橋、反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反「一帶一路」、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他們以這些違背香港發展規律的手法，來阻礙與內地的交流，影響香港經濟的發展。

選民看透反對派醜陋面目

今次補選結果，突顯選民對老面孔的厭倦，以及對政治議題的冷淡。李卓人就是反對派的老面孔，而且他奉行的也是泛政治化的議題。李卓人多年來一味挑動勞資對立，製造社會矛盾。李卓人的政治生涯，是領取政治黑金反中亂港，大搞分裂和「兩獨合流」。

李卓人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被揭1994年至2014年公然收受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約1300萬港元。職工盟事後承認每年平均接受資助金額約60萬港元。至於2014年廉政公署介入調查黎智英政治黑金，法院紀錄指工黨副主席李卓人共收黎智英150萬元款項。

今次選舉李卓人仍然操弄政治議題，其選舉主題是反DQ、反填海、反中央、反特區政府、反發展、反造地。李卓人在選舉中挑動對立，瘋狂打「反中牌」、「抗中牌」，在社會上製造對立對抗氛圍、營造市民的恐慌和焦慮，連馮檢基這個反對派老將都被打為「舔共」。直到選舉當日，李卓人和反對派還在無所不用其極攻擊對手，又近乎瘋狂地暴力衝擊對手，種種言行選民看在眼裏，選舉的結果讓李卓人票價票價。

最令人不齒的是，選前選後李卓人均指摘馮檢基「鏢票」，但選後證明，陳凱欣獲得106457票，比李卓人和馮檢基的得票總和還要多901票，可見「鏢票論」根本不成立。反對派只知談過他人，從不檢討自己，其實兩次補選失利，不是別人「鏢票」，而是他們表現太爛太不堪。

李卓人敗選，其實正反映廣大市民愈來愈理智和冷靜，更顯示主流民意厭惡泛政治化這種劣質政治的炒作，不希望見到香港社會繼續陷入劣質政治的泥濘之中。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機遇所在。

立法會作為建制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更責無旁貸引導、推動香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為香港贏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兩岸關係

楊親華

（二）

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產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表示「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同時，美國政府宣布與台灣當局結束「外交關係」，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這表明中國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建交三個條件已被美國所接受。中美建交談判從1978年7月開始，一直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為我們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掃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礙。

兩天後，1978年12月18日，我們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帶領全黨自始至終發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科學把握國內外形勢，抓住有利時機，從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及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中，及時指導全黨全國實現工作中心的轉移，並適時推動我們黨確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們黨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序幕。

在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根據自己的長期思考連續就對台工作發表了八次重要講話

，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從而形成了新時期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說，中美建交解決了台灣問題的一半，還有一半靠我們自己。鄧小平說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中美結束30年敵對狀態，還是靠中美領導人坐下來談，國共兩黨的事是中國人的事，還是要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

和誰談？鄧小平明確表示，要和蔣經國談，以蔣經國為對手。他說，蔣經國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是成功了的領導人，只有他才能說了算數，不跟他談，我們跟誰談？

談什麼？鄧小平明確表示，談統一。統一有條件。國民黨提幾條，我們提幾條，談不攏大家分手，下次再來，又再拿幾條新建議，交換交換意見。

鄧小平針對當時黨內仍把武力作為解決台灣問題主要手段的思想情緒表示，現在要用武力解放台灣，如果現在馬上表態，我相信全會的所有中央委員都會百分之百全部贊成。但鄧小平表示，我們要考慮打這一仗是否得到人民的同情與支持。鄧小平指出，沒有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任何軍事上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政治上最終必歸失敗。在這種情形下，你們會支持打這場戰嗎？鄧小平又表示，是不是永遠不打，也不是永遠不打，但至少五年、七年不打。留下這時間作什麼？鄧小平回答說，我們需要時間建設，建設黨、建設國家，這也是這幾天開會的中心問題、如何把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五年、七

年時間不夠，不妨把時間再拉長一點也沒有關係。第二點要給台灣和蔣經國時間，我們要重新評估國共兩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還有分歧，需要一段時間互相了解。鄧小平指示，福建前線可以馬上停止炮擊，第一線部隊可以部分退到第二線，但不打不等於不設防。

鄧小平說，現在我們與台灣還談不上進行和平談判，還在創造條件階段。他強調說，促使條件成熟在我們，不在他們。主動在我們。他表示，兩岸的接觸，如果公開不行，秘密的也好。以我想，秘密的比較好。大家先磋商磋商，大的原則談妥了再公開。他還說，如果在北京、台北談不好，可以在東京、在紐約，在新加坡也好。能談就是成功的一半。鄧小平說，創造條件，可以提出互相搞一點貿易。這是國際貿易嘛！通商以外還可以提通郵、通航、兩地人民往來等等。第一步先把關係拉近一點，先搭臨時便橋再搭統一之路。

鄧小平強調，要有耐心。不要說上兩句好話，看看沒有反應，或者被對方差了兩句又翻了。能不能有耐心、能不能做足功夫，細緻去做，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我們必須造成這樣的局勢，讓台灣當局迫切的感到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走和談的路，一條是走滅亡的路，只有這樣的威脅始終圍繞在他們身旁，他們才願意去認真想一想，否則他們連想都不會想。只有不斷給他們有戰爭的壓力，他們才會體會到這樣的負擔。有

了這樣的壓力就可以迫使他們多想一想，該怎麼辦？很簡單，就是大家坐下來談。

最後，鄧小平強調一點，就是要留一手。他說，我們為什麼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呢？這就是留一手，一旦需要，我們隨時可以使用武力解放台灣。他說，這與前面說的並沒有矛盾，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任何談判都要有實力作後盾，放棄武力解放的保證，實際上等於綁住了自己的手腳，特別是今天台灣擁有超過福建前線兵力的情況下，有可能因為某些決策者的頑固立場使得和談無限期拖下去。

鄧小平在全會期間提出一系列對台工作指導原則為全黨所接受。作為體現三中全會最重要成果的公報關於對台工作是這樣表述的：「全會認為，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着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公報第一次以「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來代替「解放台灣」的提法，表明我們黨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上已經做出重要轉變。

（三）

1979年1月1日，全國被鄧小平稱之為「不平凡的日子」，這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首次以最高國家權力機構的名義闡明了中國政府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

方針。《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害。《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我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告台灣同胞書》明確倡議，通過商談結束台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撤除阻隔兩岸同胞交往的藩籬，推動自由往來，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

同一天，鄧小平主持召開全國政協元旦座談會，座談討論《告台灣同胞書》。鄧小平在會上表示：「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告台灣同胞書》，體現了我們對台灣的回歸和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基本態度。」它表明「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告訴台灣同胞書》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台方針政策的重要宣示，標誌著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與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開闢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而且從而也開闢了對台工作的新時期。它對於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對黨的對台方針政策的不斷發展，至今仍然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